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本质阐释

方 果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基于“两个大局”的历史语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本质体现在时代大势、时代使命、时代要求、时代安全四个密切联系的层面。在时代认知方面,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深刻把握国际秩序重构与国内转型发展的复杂关联,为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价值引领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律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有机结合;在实践创新领域,通过高质量发展破解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局限,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路;在制度支撑方面,构建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新架构,实现发展活力与稳定预期的动态平衡。这一思想体系通过时代认知的科学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生产方式的实践性和制度演进的发展性等多重特质的有机统一,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而且在理论范式上实现了创新突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大势;时代使命;时代要求;时代安全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12-0020-10

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特定时代的规律与逻辑。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¹⁴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时代本质与经济生产、交换方式及社会结构间的紧密联系。当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2]¹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洞察历史前进逻辑与世界发展潮流,系统阐释了时代大势、时代使命、时代要求和时代安全及其内在联系。时代大势彰显全球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发展走向,时代使命承载实现民族复兴、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时代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等关键领域,时代安全关乎国家稳定、人民福祉的坚实保障。这些要素相互交

织、相互影响,共同勾勒新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构成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关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亟须对新时代本质的认识由经验层面提升至学理认知——从“中国之治”中提炼“中国之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3]。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呈现辩证统一:学理化彰显本质性与科学性,体系化体现系统性与规律性,且学理化对体系化起决定性作用。深入探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本质,既是响应党的号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使命担当,也是为在风险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提供理论支撑的迫切需要。

收稿日期:2025-08-02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二十届四中全会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要求研究”(2025ZX002);吉林大学项目“大思政课下‘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改革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2024JGY052)。

作者简介: 方果,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

一、时代大势：世界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逻辑

时代大势展示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汇聚着社会变革的新信息,蕴含着复杂多变的新机遇新挑战,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唯有深刻认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才能正确判断形势,作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学决策。

(一) 国际格局：全球秩序重构与文明范式转型的历史交汇点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世界正置身于意义深远的抉择关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35}伴随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拓展以及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加速演进,发展中国家以群体性的姿态崛起,业已构筑起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这一态势从本质上奠定了人类未来趋向光明前景的基础。然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阴霾仍旧挥之不去,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行径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严峻冲击,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温,人类社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4]49}。这一大变局绝非偶然,它标志着世界历史进程正在历经全局性与根本性的深刻转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有着深远影响。随着世界上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这种变局正引领人类趋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新文明方向,预示着传统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式世界霸权格局将被打破,催生出崭新的世界秩序架构。因而,当下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实则是旧有世界格局与价值体系陷入危机的外在表征,同时也是新国际体系与文明形态孕育萌生的重要契机。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嬗变与系统性重构,要求我们建立更具解释力的学理化、理论化体系,以准确把握国际体系演进的结构矛盾与辩证发展规律。因此,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4]318}。从本质上看,当代国际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这一矛盾运动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出周期性危机加剧、阶级鸿沟扩大、体系性不平等持续固化等特征。

与之形成制度性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持续的制度供给与治理能力创新,实现了从“后发优势”到“制度优势”的范式转换。中国之治的成功实践不仅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线进化论迷思,更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替代性方案。尽管当前国际权力格局仍处于“西强东弱”的量变积累期,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国际秩序正经历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东升西降”不仅是权力转移的表层现象,更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这一历史进程预示着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旧秩序终将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所超越。

(二) 国内情境：战略机遇期与风险挑战期的辩证共生格局

在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辩证统一中。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同一性与斗争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动态变化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4]22}这一重要论断既准确把握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也为我们构建“双向互构”的战略思维框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既要“以‘中国的世界观’把握中国对国际环境的能动影响,又要以‘世界的中国观’考察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反响,最终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种矛盾分析方法,为我们理解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转化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引。

从战略机遇期看,新时代中国发展呈现出三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性机遇。一是在全球治理层面,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思维超越了西方零和逻辑的思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国际间的互动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而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强调“和合共生”“合作共赢”,体现了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49}这一理念强调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超越了传统的零和思维,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维。二是在实践路径创新方面,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形成了系统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的普惠性与共享性,倡导共同发展、共

同富裕的理念,与赢者通吃的传统发展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共同安全,打破了传统安全观中“安全悖论”的困境,即一国为增强自身安全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全球文明倡议》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倡导文明互鉴,摒弃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观点,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5]。三是在价值取向层面,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实现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现代性的范式转换。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现代化道路往往强调单一的发展模式与价值标准,而中国对外战略则“为世界上真正谋求发展、和平、独立的国家与民族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与方案”^[6]。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多元现代性的尊重与倡导,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发展话语体系中从追随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新的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发展进程始终面临深层社会基本矛盾外化的风险挑战。“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567-568},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深层动力,也指明了中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特征,其复杂性前所未有:一是国际格局层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正面临守成国家的全方位遏制。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国际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制度性摩擦持续加剧,消极“中国观”的意识形态建构与系统性打压相互强化,使得各类突发性国际政治经济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显著提升。二是全球治理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与地缘政治冲突相互叠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功能性紊乱。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与高债务、高风险、高波动的“三低三高”的结构性困境,严重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三个“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深刻揭示了这一特点:“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现在要顶风而上”;“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现在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8]。三是国内改革层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体制机制障碍形成叠加效应,改革进入攻坚期,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现实约束,制度创新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同步提升。这一系列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4]2}的战略方针。

这一辩证发展格局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矛盾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科学论断。从2002年“战略机遇期”概念的提出,到新时代的战略调整,深刻体现了“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决策”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发展理论实现了三重突破:在认识论层面,解构了现代化路径的单一性神话,确立了多元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在实践论层面,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辩证统一,突破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悖论;在价值论层面,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模式,超越了工业文明的局限性。这些突破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便车,也受惠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原来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观’也逐渐扭转”^[9]。当前,“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合力的统一体,中国通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具包容性方向发展,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重构又持续反作用于互动方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方法,既要深刻认识风险挑战的历史性特征,又要准确把握化危为机的实践路径,在危机中培育新动能,在变局中开拓新局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二、时代使命:中国式现代化驱动的民族复兴路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的核心主题,具有三个本质特征:全局性、本质性和未来指向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时代使命的发展遵循“问题—使命—担当”的辩证逻辑,每个历史时期都面临其独特的发展问题。党的二十大将时代使命迭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18}。这一论断既体现了历史连续性,又彰显了时代创新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论建构的实践导向,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13}。这种理论发展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既在理论维度深化了时代使命的内涵,又在实践维度构建了可操作的实施路径。

(一) 使命迭代的客观依据

经典作家对时代问题的论述为阐释时代使命提

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289-290}这一论断揭示了时代使命与社会矛盾的内在关系,确立了其理论根基。列宁从客观决定性维度指出,时代使命的形成不依愿望、动机、言论为转移,而取决于客观环境^[11]。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2]这些经典论述共同构建了解时代使命的辩证分析框架,其内在逻辑包含三个相互作用的客观向度。在动力层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根本动力。当生产力发展突破既有生产关系适配边界,矛盾便外化为关键社会问题,进而倒逼时代使命围绕解放生产力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导向,正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桎梏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回应。在制度层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形成结构性约束,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进行适应性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不仅需要重构产权制度、革新资源配置方式等经济基础要素,更要同步推进上层建筑的系统性革新。在观念层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认知基础。社会存在的客观变革必然推动认识论的范式跃迁,催生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体系;而先进的社会意识则通过价值预设和理想建构,为社会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引。这一辩证逻辑深刻体现在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中:当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遭遇生态阈值时,其内在矛盾不仅解构了原有发展理念的合理性,更促成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觉醒。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抉择,既是对资源环境客观约束的理性回应,更是发展哲学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知革命,彰显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

这三重维度通过“物质动力、制度约束、认知指引”的递进机制,共同形塑着时代使命的内容与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轨迹严格遵循“矛盾转化—问题显现—使命迭代”的辩证逻辑,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生产力解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这一历史进程既印证了社会发展规律,也体现了“新需要引发新任务”^{[7]531}的辩证发展观。立足新时代,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需求与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社会领域共同富裕目标与分配不均的现实差距、生态领域可持续发展诉求与传统增长模式的深层冲突,共

同构成时代使命迭代的现实依据。这种更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动态回应,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法则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

(二)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内涵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3]这一论断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作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方法论本质。当前,“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4]15}。面对“两个大局”,必须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确保时代使命的顺利实现。

第一,以辩证思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精髓。毛泽东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4]的论断,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哲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现代化。从普遍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从特殊性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其理想信念和性质宗旨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在规模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发展难度和影响深度远超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完善,实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同步加深的弊端;在发展结构上,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中的精神危机;在生态维度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摒弃了殖民扩张的霸权之路。这种辩证统一的认识,既把握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创新突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以系统思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了明确规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20}。这一系统表述包含三个层面的逻辑结构:一是领导核心与制度保障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政治保证,确保现代化建设的

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制度根基,为现代化提供制度优势。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二是五位一体发展层面。在经济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在政治领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在文化领域,“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彰显文化自信的精神追求;在社会领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生态领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理念。这五个方面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形成并联式发展格局。三是全球治理与文明形态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标志着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发展。二者共同拓展了现代化理论的新境界。

第三,以整体性思维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体现了系统观念的方法论自觉。在横向维度上,其本质要求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体系;在纵向维度上,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等根本问题。这种整体性思维,既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单线突进的弊端,又通过各要素的协同发展,构建了“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

实践表明,只有坚持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确保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更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 实践维度的发展战略建构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时代使命提出了五大实践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发扬斗争精神^{[4]22-23}。这五大实践要求构成了有机统一的实践框架,这一框架以政治统领—制度根基—价值引领—动力源泉—实践保障为内在逻辑。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实践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统领和制度根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时代使命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视域下,中

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现代化价值坐标从资本逻辑向人民逻辑的根本性转换,构建了一种超越西方资本至上的新型现代化范式。这一理论创新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实现:一是在主体性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设计,从制度上确立了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将资本积累作为元叙事的局限性。二是在实践层面,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数字治理技术的创新应用及社会组织培育等渠道,构建了全民共建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使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在中国语境下获得了新的实践内涵,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参与渠道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动能。三是在价值目标层面,针对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构建了涵盖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完整调节体系,通过精准扶贫、社会保障网络建设和累进税制等制度创新,形成了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良性机制。这一创新实践通过将人民置于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既突破了西方资本中心主义的发展困境,更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人类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新方案。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2]11-12}。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开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当前,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与国内改革深水区的双重挑战,深化改革更具有多重意义:一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制度效能;二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要保障,构建安全发展体系;五是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建设的战略举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2}。正是基于这些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深化改革框架,系统部署了

十四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创新,其核心要义在于: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既强化创新引领的内生动力,又完善制度保障的治理效能。这种改革实践通过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良性互动,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发扬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唯物辩证法揭示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并阐明了社会进步通过矛盾的辩证运动得以实现。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重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和历史考验。“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5]的斗争意志和“该斗争就要斗争”^[16]的政治担当,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把握。从实践维度看,斗争精神具有三重理论特质:一是作为认识论方法,要求准确识别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案提供依据;二是作为实践论原则,强调通过积极作为推动矛盾向有利方向转化;三是作为价值论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斗争的根本取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基础上的斗争哲学,既不同于回避矛盾的消极保守主义,也有别于夸大斗争的激进冒险主义,而是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发扬斗争精神就是要以历史主动把握发展机遇,以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以创新实践突破发展瓶颈,最终实现矛盾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辩证统一。这种斗争实践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发展完善,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时代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在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的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刻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7],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新态势,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供给,“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2]19}。这一战略性调整既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积极回应,更凸显了高质量发展在破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的历史必然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与时代创新。

(一) 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592}这一方法论指引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物质基础出发,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一战略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列宁关于“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8]的论述,为分析矛盾转化提供了认知工具。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将需要区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递进层次,深刻揭示了人类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前后呈现出显著差异:在矛盾转化前,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主要体现为对基本生存资料的渴求,反映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绝对匮乏状态下的低层次需要;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美好生活需要则表现为对高品质生活、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追求,具有鲜明的高层次特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24》显示,“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8%”^[19]。这一结构性变化标志着居民消费方式实现了从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的根本性转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全方位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同样经历了深刻演变。在主要矛盾转化前,“落后的社会生产”主要制约经济规模的扩张,表现为“有没有”的数量型矛盾;而当前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主要制约发展质量的提升,表现为“好不好”的质量型矛盾。这种矛盾的转化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迁。“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20]这一国际经验深刻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实践维度看,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在发展模式、动力机制和目标指向上存在明显局限性,需要推动

高质量发展才能克服:一是在发展模式方面,必须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根本转变。实证研究显示,中国资本产出效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凸显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亟须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的新型发展范式,当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差距,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二是在动力机制方面,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需遵循科技创新内在规律。这一进程要求系统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创新价值链,持续提高研发投入的规模与效能,完善创新激励的制度化安排。当代创新理论揭示,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参量,其演进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4]28}的三元动力模型。这一理论建构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范式转换的基础性框架,其政策含义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持续生成发展动能的结构性优势。三是在目标指向上,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经济质效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改善与制度创新驱动四位一体的新型发展范式。这一目标架构的实现需要整体性变革方案:在产业发展领域,通过动力系统转换,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跃升;在民生建设方面,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缓解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在环境保护上,加速绿色低碳转型进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在体制改革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清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壁垒。这种多维协同的转型路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的当代实践,更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选择。其本质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最终形成生产关系动态调整与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相互促进、协同演进的良性机制。

(二) 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规定与价值内核

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1]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本质要求,就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以高新技术为驱动、高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

全”^[22],通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创新生态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动能。这种新型生产力形态不仅能够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更是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选择。

从历史维度考察,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随着科技进步和认识的深化,生产力已从以机械化、电气化、化石能源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生产力,发展到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标志”^[23],以高新科技、高素质劳动力和高品质生产资料为依托的新质生产力。这种演进体现了人类对生产力认识的深化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19},而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都建立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基础之上。科技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内在动力和可靠支撑,其实现程度直接取决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例,这一经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制造业为主干、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其实现过程必然依赖于新质生产力所提供的技术支撑和要素保障。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决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从实践维度分析,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路径。回溯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国经济已实现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投资、消费及需求结构面临新的变革,产业结构亟待优化调整,城乡区域发展也需探寻新路径。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期,传统发展模式严重制约高质量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体制机制性障碍导致要素流动受阻、统一大市场建设尚未完备、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升;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适配性不足;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产业经济单一化、人才流失、精神文明建设滞后、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薄弱、基层组织凝聚力弱化等问题;生产要素空间分布失衡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重点领域改革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等。因此,亟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来破解这些困境。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蕴含着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新发展理念体现了执

政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最新认知成果,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够有效消解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使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发展的内生特质,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唯有精准把握并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方能有效破解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矛盾,妥善应对外部冲击,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推动发展格局从“不平衡不充分”向“平衡充分”转变,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加速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综上所述,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刻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在新征程上,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动力,也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战略选择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彰显了实践探索的创新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四、时代安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与能力重塑

当前,在“两个大局”深度互动的背景下,中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遭遇日趋复杂的风险挑战。历史经验表明,若缺乏稳固的国家安全根基,再美好的愿景也是空中楼阁;若不能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得不到保障,民族复兴使命就会中断。随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叠加效应日益凸显,安全威胁的传导性、联动性特征持续强化,国家安全治理面临着体系性变革的迫切需求。在此情形下,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与能力重塑,不仅是应对复杂安全形势的实践要求,更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抉择,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效能提升,实现安全治理现代化与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协同共进。

(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制度性必然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国家安全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建制,其保障效能直接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代化转型的质量。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国家在积贫积弱与发展振兴两个历史阶段,往往面临最为严峻的安全压力。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以惨痛教训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缺失必然导致发展进程的断裂与现代化尝试的挫败,国家安

全战略的选择及其制度效能,已成为影响国家命运的关键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球安全格局呈现出的“东治西乱”态势,其本质在于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通过制度化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机制,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治理范式,为“中国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处于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提出制度治本之策:“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强化法治思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程相适应。”^[24]这一思想从制度建构层面,确立了国家安全格局稳定性的保障机制。现代国家治理理论认为,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与强大的国家安全能力,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效能的关键性衡量标准。

基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化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战略思想,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2]⁴⁴这一战略思想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规划了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完善涉外安全体制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路径,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创新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政治智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二)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人民安全需求发展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人民安全需求的制度化实现。马克思明确指出,“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7]⁴²。这一经典论断不仅揭示了“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更指明了国家安全治理的价值归宿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建立“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安全治理从“统治职能主导型”向“人的全面发展保障”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的需求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化,必然要求安全供给从“政权维护主导型”向“民生需求响应型”升级,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规律。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本质上是人民安全需求从生存保障向全面发展的质变跃迁。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群众的安全诉求必然呈现“需求体系的结构跃升”:在客体维度上,从物质财产安全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价值保障;在主体维度上,从被动接受安全供给转向主动参与安全治理。这一规律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必须实现“双重制度创新”:在治理架构上,构建全周期、全过程、全覆盖的复合型安全供给体系;在运行机制上,形成“人民需求—政策调适—效能反馈”的辩证治理闭环,使安全治理效能转化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

中国特色的安全治理现代化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7]584}的思想。通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度化,中国实现了安全治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安全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22}的治理目标,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型制度环境。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当安全治理真正成为“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过程,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安全愿景。这种治理模式的世界意义在于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安全观,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安全文明形态。

(三) 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机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转化逻辑

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持续转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密切相连的三个方面:一是从制度结构看,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演进,将社会矛盾的运动规律转化为制度适应性优势,在“制度—环境”动态适配中实现国家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二是从治理效能看,聚焦制度执行的实践向度,通过组织学习、技术赋能与跨部门协同构建覆盖战略规划、过程管控、结果评估的闭环体系,推动制度执行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效能跃升,将制度的规范性转化为实际治理能力。三是形成制度优化与效能提升的双向建构机制。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286}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制度设计必须以人民安全利益诉求为价值坐标,避免陷入脱离实际的空想。当代中国“问题导向—

利益协调—制度创新”的治理实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治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契合“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25]的理论发展规律。在这一理论逻辑指引下,国家安全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表现为制度效能的转化过程。制度效能转化的具体机制呈现出三重特征:一是制度供给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治理体系通过构建“适应性效率”的制度框架赋能实践能力。中国应急管理体系以“全灾种、大应急”制度创新提升风险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供给对能力建设的奠基作用。二是实践需求向制度创新的转化,基层安全治理中孕育的实践智慧如“枫桥经验”,通过制度化渠道提升为国家治理方案,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精髓,印证实践需求对制度创新的驱动作用。三是主体能力向体系韧性的转化,治理主体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能力并反作用于制度结构优化,形成治理能力与制度效能的双向赋能,构建“制度—能力”的良性循环。

三重理论维度与转化机制形成辩证统一体。制度结构分析奠定规范性基础,实践效能转化搭建动态赋能桥梁;制度供给回应实践需求,能力提升巩固制度优势,推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螺旋式发展。这一统一体既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也为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内嵌于一种实践驱动的认识论框架,其核心是动态把握矛盾运动与系统协同的辩证关系。唯有以人民安全利益为制度创新核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知、可持续的治理成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6]与“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27]的辩证统一,在此进程中体现为: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通过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协同共进,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历史性跨越,为民族复兴筑牢安全屏障。

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两个大局”交织叠加的历史语境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系统把握时代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趋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系统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以高质量发展为实践指向,科学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要求;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这一思想体系展现出四重本质特征:在历史维度上体现为对时代大势的与时俱进把握,在价值维度上

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实践维度上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在发展维度上开放创新的理论品格。这种系统化的理论特质,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具有解释时代的理论深度,又具备引领实践的现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
[3] 习近平.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11-30(1).
[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5] 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J].社会科学,2023(11):5-24.
[6] 田鹏颖.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J].思想理论战线,2024(3):1-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1-122.
[9] 肖晞.新形势下世界“中国观”的变化与加快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路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1):40-5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11] 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49.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0.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59.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3.
[18]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6.
[1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4[EB/OL].(2025-02-28)[2025-02-28].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tjgh2020/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2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36-137.
[21]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
[22] 习近平.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J].求是,2025(7):4-10.
[23] 周绍东.数字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4):37-50.
[2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235.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68.
[26] 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45.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5.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Tim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ang Gao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stitute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of “two major situation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re reflected in four closely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namely the general trends of the times,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times.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the times, it applie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o deeply grasp the complex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at home, 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t the level of value guidance, it adheres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 developmental laws of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strategic goals of modernization drive. In the field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it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odel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lazes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respect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it establishes a new framework for modernizing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realiz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al vitality and stable expectations. By organically unifying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s, the people-centered nature of its value orientation,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its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it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this ideological system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ut also achieves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heoretical paradigms, pioneer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general trends of the era; mission of the era;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security of the era

责任编辑:思 齐